朱子《詩集傳》中的歷史論述

朱熹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委員會編，《宋朱熹吳說墨蹟》（收入《故宮法書》〔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0〕，第十四輯），頁 1 。

張　元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古今論衡　第 20 期　2009.12

一、前言

《詩集傳》是朱子著作中，享譽甚高，影響甚遠的一部名著。❶這部書，在傳統的四部分類中屬於「經」部，在今天的學術分類中大概都置於「文學」類，看來皆與「歷史」並無直接關係，談論其中的「歷史論述」，似需略作解釋。筆者認爲，我們理解一部經典作品，探討其中精義，並非一定需要依據過去以及現在的分類。我們與其執著「分類」的觀點來談，不妨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部經典作品在今天的學術標準下，有那些成就可以給我們一些啓發，依然值得我們誦讀再三。

朱子《詩集傳》的內容甚爲豐厚，本文僅從「歷史論述」的角度，對這部書作簡要的分析。然而，「歷史論述」又是一個十分宏大，卻不是十分清晰的概念，這裡不想多所解說，只是把它視爲一般詞彙，就好像說「歷史是怎麼寫的」，來看朱子在這部書中，如何把那個時代的「歷史」呈現出來。這裡所說「怎麼呈現出過去時代的歷史」，不是說朱子寫出的「歷史」是什麼，而是朱子如何去思考、建構和表述那過去的世界。

《詩經》包含豐富的過去世界的資料，這一句話大概無人否認，至於這些資料的含義是什麼，迄今爭論不休。我們只看宋代學者，相信詩序的，與不相信的，儼然兩大陣營。朱子不信詩序，但好友呂祖謙則十分相信；鄭樵對詩序抨擊甚力，宋末的馬端臨則對朱子的不信詩序，不能認同。這種對《詩經》一書的兩種看法，「保守」的一方，聲勢似乎越來越弱，但至今有人繼續堅持，他們只要問：《詩經》的作者，是士大夫？還是一般民衆？如果是士大夫的話，許多詩篇就不可能只是單純的「民間歌謠」。現代學者，持此一看法的，朱東潤和錢穆可爲代表。❷這是一個大問題，這裡不作討論。我們的問題是，過去的學者如何利用這些資料來認識過去？如何藉由講述《詩經》中的篇章，引導後人對於昔日的世界有一眞切的了解？學者之中，有的十分嚴謹，有的較爲粗略，朱子就是極其嚴謹的一位，值得我們注意與學習。

❶ 朱子的《詩集傳》，非但在元、明、清代爲參加科舉考試者所必讀；即在學術發展中，亦甚重要，如程俊英、蔣見元就說：「《毛序》、《朱傳》是二千年來《詩經》研究中影響最大的兩部典籍。」見氏著，《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169。本文所用之《詩集傳》爲華正書局（臺北，1996）出版。

❷ 朱東潤，《詩三百篇探故》（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錢穆，〈讀詩經〉，載《中國學術思想論叢》（一）（臺北：東大書局，1976）。

朱子治學十分嚴謹，毋庸贅述。這裡只想提一下朱子怎麼看經、史之間的關係。我們從《朱子語類》中觀察他與學生的談話，必能感到在朱子心中，經學與史學之間，存在著「不即不離」的關係；也就是說，經學不可以違背事實，史學不可以不講義理，這是他的基本主張。所以，他對程頤的《易傳》尊崇之外，不無微辭。他寫《易本義》，就是不同意程子過於強調哲理，而是從兼顧歷史的觀點來闡述根本的道理。朱子認爲，程子的《易傳》，道理講得很好，但有的地方發揮得太多，有失聖人原意；有的地方則思考不周，不合情理。❸這就是說，朱子講經學，很重視歷史，因爲經書雖然或出於聖人手筆，或經聖人審定，卻都是歷史的產物，我們就要從歷史的角度來了解；朱子解經，既要明確陳述書中記載的實際情形，也要對它的意義作深入的闡釋。

重視事實，精細辨析之外，朱子還很強調表述的結構。朱子的著作，博大精深，今天我們特別留意的，應該是他表述之時所採用的方式，也就是那十分完整的形式與極其嚴謹的「結構」。舉例來說，朱子所撰〈開阡陌辨〉一文，討論商鞅廢井田、開阡陌一事的歷史解釋，他對有關資料反覆參證，得出的看法，透闢精卓，後人長期信服。但是，最可以令我們讚嘆與欽佩的，則是朱子論證的方式。筆者以爲，朱子這篇文章，從結構上看，是由：提出有意義的問題、選取重要資料、形成堅實論證、結合歷史情景、運用歷史想像、說明事物情理，以及闡述歷史意義等部分所組成，與今人研究歷史所強調的重點與步驟，幾無二致。❹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朱子的論述，其形式之完整與結構之嚴密，是其特色所在，值得我們重視。本文即從「表述的結構」此一角度，簡要說明《詩集傳》一書中的「歷史論述」。

二、字與詞的釋義

「字」與「詞」的解釋，是文本解讀的基礎。我們無法想像，經典著作中的字與詞未有清楚解釋的情況下，讀者能夠了解文中的意義。當然，到了宋代，經典注釋早已有之，且已形成十分龐大、複雜的注釋傳統。問題在於，如果全然接受這個注釋傳統所提供的訊息，那也就不必提出新的詮釋了；若欲提出新的詮釋，必須從字與詞的解釋做起。

❸ 請參閱張元，〈朱子講歷史之三：評伊川《易傳》中的史例〉，《歷史月刊》205（2005）：118-119。
❹ 請參閱張元，〈朱子講歷史之六：廢井田與開阡陌〉，《歷史月刊》218（2006）：114-118。

朱子在《詩集傳》中，「字」與「詞」怎麼解釋呢？我們不妨以《詩經》的第一首詩〈關雎〉的首章：「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爲例，略窺朱子的做法。在這一章中，朱子對於字與詞，做了如下的解釋：「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我們再看朱子之前，今天還能見到的宋人解《詩》之作，怎樣處理字與詞的解說。我們翻閱「學苑出版社」所刊行的《詩經要籍集成》這一套書中，可以看到，歐陽修的《詩本義》，主要是由「論」與「本義」兩部分組成，「論」爲訓釋章句的文義，幾乎未及字與詞的個別意思。蘇轍的《詩集傳》，作了一點字、詞的解釋，例如〈關雎〉首章四句爲：「關關，和鳴聲也。雎鳩，王鳥之摯者也。水中可居者曰洲。逑，匹也。」蘇轍所作的解說，比起朱子，顯然簡略得多。其後，范處義的《詩補傳》、王質的《詩總聞》，都未見對字與詞作個別解釋，至於鄭樵的《詩辨妄》與程大昌的《詩議》就更不可能有了。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這部書與朱子的《詩集傳》是同一時期的作品，形式頗爲接近。❺就字、詞的解說來看，呂著是：「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曰洲。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我們可以從這幾個例子看出，這些字詞的解說，基本上是一致的，因爲其來源相同，都取自昔日的「注釋傳統」，那裡有豐富的資源，可供選用。

宋代學者對於經典文本的字、詞解說多採自昔日的注釋，仍有其意義，值得一談。首先，這些學者把字、詞的解說抄錄下來，認爲這些足以採信，決不是一種機械的工作，而是經過一番認眞的思考。同時，選取字、詞的個別解說，並不表示完全接受傳統的說法，仍然可以有自己的闡釋。就以上引「雎鳩」的解說爲例，朱子明顯取自《毛傳》，卻又提出闡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同樣是這一個詞，呂祖謙的闡釋就不一樣，他是這樣說的：「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我們看到了，朱子重視的是個別的「性情」，而呂祖謙強調的則是可能的「影響」。不同學者對於同一個字或詞，儘管採取同樣的解說，仍然可以在文本脈絡中發揮出各自不同的詮釋。

❺ 朱子書中屢引東萊呂氏之言，而呂書中引述朱子之言處亦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呂氏家塾讀詩記》，宋呂祖謙撰。此其說詩之作也。朱子與祖謙交最契，其初論詩亦最合。此書中所謂朱氏曰者，即採朱子說也。後朱子改從鄭樵之論，自變前說，而祖謙仍堅守毛、鄭。故祖謙沒後，朱子作是書序，稱少時淺陋之說，伯恭父誤有取焉。既久自知其說有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覆其說，以求眞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云云。」（《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據清乾隆間武英殿本影印，1983〕，卷一五，經部詩類一，頁 23-24）。

其次，朱子是否提出自己對於字、詞的解釋？依理推測，十分可能，但筆者不是《詩經》方面的專家，對這部經典所下的功夫甚爲有限，無法提出全面的確證。不過，我們可以從當今通行的《詩經》注釋著作中，檢視有無採用朱子對字、詞的個別解釋，也可以看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我們以程俊英、蔣見元合著的《詩經注析》爲例，可以看到許許多多的詩篇注釋，都引用了朱子《詩集傳》中的意見，其中字、詞的個別的解說，當然也不在少數。朱子十分重視字、詞的解說，因之他的解說相當審愼、細緻，把每個字或詞的精確特點，以及字詞之間的細微差別，都清楚呈現出來。舉例來說，〈雎鳩〉的第二章中，有「輾轉反側」四字，朱子的解說是：「輾者，轉之半；轉者，輾者周；反者，轉之過；側者，轉者留。皆臥不安席之意。」我們都知道，這四個字形容翻來覆去，不能安眠，但朱子卻把每一個字的原意說出來，還區別了其中細微的不同，最能呈現他處理字、詞的特點。再以〈邶風・谷風〉中的一句「就其淺矣，游之泳之。」爲例，看朱子怎麼解說「游」、「泳」兩字。《詩集傳》：「潛行曰泳，浮水曰游。」作了很清楚、細微而又生動的區別。這種例子很多，且不限於《詩集傳》。朱子講《易經》的〈无妄〉，說：「災，是禍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❻將「災」與「眚」二字的細微差別區分出來，即爲一例。

不過，朱子釋字或詞的重點，似乎不在其個別的意思，而是在整個文本脈絡中的意思。例如：〈小雅・信南山〉首章有云：「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朱子在《詩集傳》中解疆、理二字曰：「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洫也。」顯然已經不是字面的解釋，而是結合文本情景所做的說明。這種說明，其特點就是進一步、深一層，勾勒出整體圖像，而不是只作表面的字義解釋。再舉一例，〈魏風・陟岵〉末章有云：「行役夙夜必偕」，「偕」字是一起的意思，《毛傳》的解說是「偕，俱也。」但朱子則說：「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以「不得自如」來解釋「偕」的意思，顯然既深入，又符合其時情景。

第三，既然書中每一個字或詞都經過一番思考，昔日注釋之中，不盡滿意的，可以提出自己的解釋，但對舊說不能同意，自己又一時提不出適當的新解，怎麼辦呢？那只有明白的說：「其義未詳」。這一類的例子，並不很多，且多見於〈雅〉、〈頌〉部分。茲舉一例，以概其餘。〈小雅・節南山〉第二章中，有一句「有實其猗」，朱子在《詩集傳》中說：「有實其猗，其義未詳。傳曰：實，滿；猗，長也。箋曰：猗，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於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朱子明白表示，《毛傳》、《鄭箋》的解說，他不能同意，但他自己並未提出新解，只能說其義

❻《朱子語類》（臺北：華世出版社點校本，1987），卷七一，頁 1799。

未詳。這裡可以看出，朱子對於每一字、詞的解說，都是仔細思考，力求妥切，否則寧願存疑。另一方面，朱子對前人的訓釋還是有一定的尊重，儘管並不同意，覺得有所不妥，甚至於理未通，但仍記於書中，供讀者參考。❼

詩卷第一
國風一
朱子集傳
周南一之一

圖一：《詩集傳》元刊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❼「有實其猗」應作何解？程俊英、蔣見元的《詩經注析》是這樣寫的：「有實其猗，形容山坡廣大。王引之《經義述聞》：『《詩》常例，凡言有黃其實、有鶯其羽、有咯其相、有捄其角，末一字皆實指其物。有實其猗，文義亦然也，猗疑當讀爲阿。猗、阿二字通用。』又曰：『實，廣大貌。〈閟宮〉篇：實實枚枚，傳曰：實實，廣大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按阿，山坡。詩人以山上有廣大不平的山坡，以興師尹的不平。」同樣的情形，見於〈大雅・桑柔〉第十二章末句「征以中垢」，朱子說：「未詳其義，或曰：征，行也；中，隱暗也；垢，污穢也。」王引之在《經義述聞》中說：「引之謹案：中，得也；垢當讀爲詬；詬，恥辱也。不順之人，行不順之事，以得恥辱，故曰：征以中垢。傳、箋及正義，皆失之。」程俊英、蔣見元上引書未提及王引之語，只說：

詩卷之一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頒在樂官以時存肆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圖二：《詩集傳》明嘉靖間贛州清獻堂刊巾箱本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詩卷之一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頒在樂官以時存肆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朱熹集傳

圖三：《詩集傳》明正統十二年（1447）司禮監刊本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

我們可以說，朱子對字、詞的注釋，十分用心，儘量找出最精確的說法，最細微的差別。同時還將字或詞與描述的情景緊密聯繫，呈現深刻的觀點與意境。如果沒有確實的把握，於心稍感未安，則寧願從闕，不事敷衍。朱子的這番努力，爲文本資料的理解，奠下堅實的基礎。

三、時間與作者的推定

《詩經》中的作品，內容十分豐美，是我們認識古代世界的重要資料。我們可以從這些詩篇中，認識並感受古代世界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以及民情之厚、風俗之淳。除此之外，還有不少征討夷狄、遠戍他方的悲歌，以及人們感於小人亂政、國事日非的哀嘆。問題是，如果我們對於某些涉及特定事情的詩篇，不能清楚知道它的時間，我們的認識就會十分模糊；如果我們認定的時間是錯誤的，反而會成爲我們了解過去事件的一項障礙。所以，弄清楚某些詩篇的時間，是利用這些資料，藉以進入過去世界之時，必須先行處理的工作。

〈國風〉部分，涉及到「文王教化」以及「淫詩」的問題，一方面非常複雜，另一方面似乎又與某一特定詩篇的時間，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談及此一問題時，似可將〈國風〉部分擱置。〈二雅〉以及〈周頌〉，其中呈現的歷史成分，十分豐厚，我們希望對於詩篇的作者與撰寫的時間，能有準確的了解，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了。❽

昔日解經者對時代的判定，朱子覺得甚不可信，主要原因在於，釋者輕率隨意，誤謬也就難免。〈小雅・常棣〉是何時之詩？《詩集傳》中有一段分析，可以清楚呈現朱子的態度。這是在〈常棣〉一詩的第二章，詩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朱子說：

「征，往，行。垢，污穢。中垢，宮中污穢之行。」再如〈商頌・長發〉第四章開始有云：「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第五章開始有云：「受小共大共，爲天下駿厖，何天之龍。」其中「小球、大球」、「小共、大共」應作何解？朱子說：「小球大球，其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玉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王引之《經義述聞》曰：「受小球大球，受小共大共。《毛傳》：球，玉也；共，法也。引之謹案：球、共皆法也。球，讀爲捄；共，讀爲拱。《廣雅》曰：拱、捄，法也。……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謂所受法制，有小大之差耳。傳解球爲玉，已與共字殊義。箋復謂共爲執玉，迂迴而難通矣。《廣雅》拱、捄並謂爲法，殆本於三家與。」程俊英、蔣見元怎麼說呢？他們採用了章炳麟《訄漢閒話》的說法：「《毛傳》球訓玉，共訓法，自有據。蓋玉以班瑞群后，法以統治諸侯。共主之守，莫大於此。是以受之則爲下國綴旒，爲下國駿厖矣。」

❽ 程、蔣合著的《詩經注析》，對〈二雅〉的解說中，有云：「〈大雅〉共三十一篇，都是西周盛時之作。〈小雅〉共七十四篇，它產生的時間最長，從西周到東周都有，以厲、宣、幽時代最多。它們的作者，多數是周王朝上層人物，少數是人民作品。〈雅〉詩的產生地，在鎬京、雒邑。〈雅〉詩的內容比較複雜，其中有周族史詩、種族戰爭詩、諷刺詩、民歌、戀歌、農事詩、貴族宴會享樂等生活詩、祭祀詩、歌功頌德詩和其他，是周代社會、家庭的一面鏡子。」在〈周頌〉部分，則曰：「〈周頌〉三十一篇，是周朝的頌歌，全部作於西周初年。據後人考證，爲周武王、成王、康王、昭王時代約一百多年間的作品。」至於〈魯頌〉與〈商頌〉，都是春秋以後的作品。

> 言死喪之禍，它人所畏惡，惟兄弟相恤耳。至於積尸哀聚於原野之間，亦惟兄弟爲相求也。此詩蓋周公既誅管蔡而作。故此章以下，專以死喪急難鬥鬩之事爲言。其志切，其情哀，乃處兄弟之變，如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而道之者。序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者，得之；而又以爲文武之詩，則誤矣。大抵舊說詩之時世，皆不足信。舉此自相矛盾者，以見其一端，後不能悉辨也。

這一段話，朱子的意思很清楚，要點有三：一、朱子依據詩句的本義，加以判定，認爲應在平定「三監之亂」之後，乃周公的作品。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朱子的做法是，掌握詩意中的情景，以及詩人作詩的心意，即可推定作品的時間，甚至作者。也就是說，朱子認定惟有將詩篇置於此時，作者定爲此人，方合乎情理。二、過去的說法，如《毛序》所說「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也。」這是對的。❾但有人把兄弟之道解釋爲周文王、武王時的詩，以闡釋封建的精神，就十分乖謬。不對的地方，主要在於整首詩所述說的是「急難鬥鬩之事」，表現出來的是「其志切」、「其情哀」，與文、武之時的氛圍完全不同。三、從上面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不少「舊說」未能照顧詩的整體意涵，對於作品的時間，妄下斷語，自相矛盾，甚不可取。這種情形，在朱子看來頗爲普遍，無暇一一辨駁，書中也就不再提及了。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朱子對於如何判定作品「時間」的基本觀念，十分清楚，而且嚴謹。因此，過去認爲是屬於某一時代的作品，長期以來，並無異見，朱子則認爲證據不足，不能遽然接受。

〈小雅〉中許多詩篇，過去都認爲是周宣王時代的作品，朱子怎麼看呢？他不是全部接受，也不是全都否定，而是要問有無依據。就像上文所述，如果合於當時的情景，朱子同意這樣的說法，反之則否。例如：〈六月〉首章，「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朱子的解說爲：「成康既歿，周室寢衰，八世而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於彘。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就是依據《序》所說的「六月，宣王北伐也。」做進一步的闡釋。接下來的〈采芑〉、〈車攻〉、〈吉日〉三首，朱子都同意是「宣王之詩也」。但是，再下來的〈鴻鴈〉，是一首敘述流民勞苦的詩，《詩集傳》中說道：「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朱子並不同意，因爲這首詩中所述雖然都是「鰥寡可哀憐之人」，卻「亦未有以見其爲宣王之詩」，也就是缺少必要的依據。其後還有若干首詩，也是如此。〈祈父〉，《毛序》以爲刺宣王之

❾ 朱子基本上仍不以《詩序》所言時世爲然，如曰：「大抵《序》之所言時世，皆不足信。」見〈節南山〉的注釋，《詩集傳》，頁 129。

詩，《詩集傳》：「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以及其後的〈黃鳥〉、〈我行其野〉、〈斯干〉等篇，皆是如此。

我們看到，朱子推定詩篇的時世，主要是從詩中的文意著手，思考體會，再參以舊說，辨別是否可信。例如：〈大雅〉的〈下武〉，朱子在《詩集傳》中說此詩的時間：「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之詩。然考尋文意，恐當只如舊說。且其文體亦與上下篇血脈通貫，非有誤也。」在這裡，朱子把「成王」解釋爲「武王所以能成王者之信」，所以還是同意《毛序》所說：「〈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然而，我們讀朱子的這段話，應該注重的，卻是朱子所說，「考尋文意」與「血脈貫通」兩句話。「考尋」不只是仔細思考，還要潛心體會；不只是「熟讀精思」，還要「虛心涵泳」。就如同朱子對學生說的：「今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卻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拾得一個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10]只有下了一番功夫，就能夠有所辨明，這是不需要什麼「充足」的資料證據的。至於「血脈貫通」，這是經常出現在陸象山文集與語錄中的話語，也是一種針對「功夫」的描述，只有功夫到了，方能看出上下篇之間，那種渾然一體，難以區隔的緊密關係，同樣也是無法用資料證據可以明確論述的。

我們再來看看朱子怎樣斷定詩篇的作者。〈大雅〉的〈文王〉，作者是誰？《毛序》：「文王受命作周也。」含糊不清。朱子《詩集傳》：「東萊呂氏曰：《呂氏春秋》引此詩，以爲周公所作。味其詞意，信非周公不能作也。」朱子講得如此篤定，他的依據是什麼呢？是「味」其詞「意」，「味」即如上文所述之熟讀精思與虛心涵泳，是一種功夫；「意」呢？那就是詩中文字所呈現的意含，而且是至爲深刻的意含。朱子自己怎麼說呢？他在就全詩的章、句做了說明之後，對整體詩的解釋是：「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也。……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多詠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修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亦勉此而已矣。」此段文字的重點，應在興亡之「理」與「敬」之一字。此理在於「先王之德」，而能否理解、把握此「先王之德」，則在後人的態度，即「敬」之有無。只有通過「敬」的功夫，理解、體會先王之「德」，進而可以明瞭先王所昭示的，人世間興亡的道理，以及天、人之間感應的原則。當然，這樣的解釋，在今天很難得到認同。讓我們看看今天怎麼

[10]《朱子語類》卷八〇，頁 2085。

談這首詩的作者問題，程、蔣合著的《詩經注析》，是這樣說的：「至於詩的作者，《呂氏春秋・古樂篇》和《後漢書・翼奉傳》都說爲是周公旦。從詩的口吻來看，倒是有可能的。但全詩句調明暢，用韻流利，尤其是已採用了蟬聯格這樣較成熟的修辭手法，同西周前期樸拙簡陋的詩風迥不相類，所以很難想像是出於周公之手，恐是西周晚期作品。」程、蔣在前文提及：「〈大雅〉共三十一篇，都是西周盛時之作。」此處又說「恐是西周晚年作品」，似有扞格，不知作何解釋。朱子仍是「味其詞意」，認爲從〈棫樸〉以下，直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11]雖然口氣十分和緩，但心中還是相信作者應爲周公。古今對比，我們的重點不應比較孰對孰錯，而是應該看看兩者方法上的絕大差異；宋人如朱子著重情景心意，而今天學者們強調的則是文章修辭。不過，程、蔣二人說：「從詩的口吻上來看，倒是有可能的。」說明朱子的思考取向，今天仍不能全盤否定，似乎還有其重要性可言。至少，朱子的觀點，諸如：作品應該呈現時代的特色，作品的價值則在於作者的深刻體會等，仍然有著重大的學術意義。

四、生活情景的描述

《詩經》中的一篇詩，就是中國古代世界裡，豐富多采生活中，一個片段的記載。我們讀它，不只要認識它所呈現的情景，瞭解它所陳述的道理，還要體會它所蘊含的意義。然而，是不是因爲歷來學者的探究，每一篇詩的基本文義，我們已無疑慮，只是解說上，各家有所不同而已嗎？朱子並不同意，他在《詩集傳》中指出，像〈衛風〉中的〈芄蘭〉，「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小雅〉的〈鐘鼓〉，「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王氏、蘇氏之說解之，未敢信其必然也。」他雖然用了王安石和蘇轍的意見，其實他是不同意的，至於此詩之義爲何？也應屬於「不知所謂」之列。相對而言，有些詩篇字詞意思明白，理解不難，過去的解釋卻十分隱晦，這是必須改正的。如〈小雅〉的〈小宛〉，朱子指出：「此詩之詞最爲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爲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朱子認爲只要根據字、詞的意思，了解表達的情意，就能明白其中精義。至於有些詩篇，前人對於整首詩的解說，十分精闢，朱子完全同意，也就直接收錄於《詩集傳》中，例如：解說〈小雅〉的〈吉日〉，全錄《呂氏家塾讀詩記》中的文字：「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復古者〔原文：皆以蒐狩爲言〕，何也？

[11]《詩集傳》，頁 182。

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朱子未做一字之增減，或許在他心目中，這就是十分理想的表述。

詩中所呈現的「情景」，每篇不同，各有特色。除了少數篇章，大多描述深刻，意境高遠。然而，詩篇反映生活中的一般情況，朱子也十分留意，作了相當精彩的解說；不妨舉出一、二例子，略加說明，或許有助我們對於全書「結構」的了解。筆者想到的第一個例子爲詩中關於「車乘」的解說。〈小雅〉的〈采芑〉首章有云：「其車三千」，朱子的解說爲：「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魯頌〉的〈閟宮〉也有句云：「公車千乘」，又云：「公徒三萬」，朱子的解說是：「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有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以及「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六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爲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這兩段「解說」，讓我們看到朱子解說實際情景的要點：一是，十分精細，一車（乘）多少人，如何配備，說得很詳細；二是，制度不一定就是實情，兩者有別。一車百人，只是「極其盛而言」，實際上未必有這個數目。同樣的情形，「三萬」也只是個大約之數而已。朱子告訴讀者，我們一方面要知道當時的制度，另一方面，制度中的詳細規定，離實際情形仍有一些距離，我們知其大概即可。

再舉「井田」爲例。〈大雅〉的〈公劉〉是周人史詩之一。敘述周人祖先公劉帶領周民由邰遷豳的史績。其第五章有云：「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朱子的解說是：「三單，未詳。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後周公蓋因而修之耳。」這裡談到井田的起源，也是其他各家解《詩經》者，未曾提過的說法。至於井田制度下的實際情景，朱子亦有述及。〈小雅〉的〈信南山〉第四章：「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朱子的解說爲：「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爲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爲廬舍，以便田事。於畔上種瓜，以盡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爲菹，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朱子在這裡講到了制度的規定，講到了實際運作的情形，還講到了這個制度所呈現的精神與意義。我們可以看到，朱子藉著對詩句的解說，用有限的字數，把一個重要制度的各方面，都做了清楚的說明。

車乘與井田，只是兩個關於制度的例子，《詩集傳》中有關生活、風俗、政事等的情景描述，所在多有，構成了古代世界的概括圖像。就以「風俗」來說，《詩經》中就有極其豐富的內容，當然也有許多的爭辯。因爲講到「風俗」，必然涉及「淫詩」，而此一問題，有關《詩經》研究的論著中討論已多，此處實無置喙之餘地，筆者也就略過不談。

朱子講《詩經》，重風俗，更重教化。《詩經》始於「二南」，此〈周南〉、〈召南〉即專言文王教化之功。⓬《詩集傳》的開頭「國風一」三大字之下，朱子曰：「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謠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爲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接著在「周南一之一」五個大字之下，朱子對〈周南〉作了簡要的敘述，其中有云：「周公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以推之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美，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朱子這兩段話，意思很明顯，主要是：我們可以從〈國風〉的作品中，看到有關風俗的好壞，同時也就知道了政治的良窳。至於什麼是好的風俗呢？那就是先王施政的成果。怎麼能夠達到呢？要從個人做起，循序漸進，遵循先王的做法，風俗必然淳美，「治世」就可以出現。所以，「二南」成了教化的典範，就如程子所說「《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此一論點，朱子是同意的。⓭

我們可以看到，朱子認爲許多詩篇是「淫詩」，是「淫奔者」所作，就是要回到這些作品眞實的、具體的情況，反映實際的生活與情感，因此對於《小序》的解釋，漢儒的說法，不以爲然。但是另一方面，經書原有的教化功能，理想性質，不應拋棄，「文王教化」怎麼說也是崇高的理念，有其不容否認的價值。如何結合兩者，在描寫實際生活的起點上，朝向高遠的目標邁進，或許成了朱子釋詩的精義所在。茲舉一例，略作說明。〈衛風・氓〉是非常著名一首詩，今天我們見到的任何一本選講《詩經》的書，都會選錄它。此詩首章：「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詩意明白曉暢。我們不管讀余冠英、吳宏一或程俊英的白話譯文，都是充滿期盼嚮往，因爲女子要結婚了，儘管後來的遭遇甚爲不幸，最後成了棄婦，可是在這首章的句子中是看

⓬ 請參讀張元，〈朱子講歷史之八：《詩經・二南》中的文王教化〉，《歷史月刊》222（2006）：114-119。
⓭《朱子語類》卷八一，頁 2094。

不出來的。朱子怎麼講呢？《詩集傳》對首章的解說是：「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與之謀而不遂往，又責所無以難其事，再爲之約以堅其志，此其計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餘，而不免於見棄。蓋一失其身，人所賤惡，始雖以欲往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這首詩，我們今天讀來，不過是一個普通女子，遭遇不幸婚姻，決定將它結束；在朱子筆下，非但斥爲「淫婦」，而且工於心計，十分狡黠，得不到幸福，是被自己的慧黠所害。從這裡，我們看到朱子還是受到《小序》的束縛，未能完全擺脫漢儒的羈絆。《小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誘奔；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偶。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應該就是朱子認定女子爲淫婦的依據，也是由於衛地「淫風大行」的緣故。不過，朱子從「一失其身，人所賤惡」作進一步的引申，談到士君子、讀書人的立身行事，發揮了一番道德的訓誨，歸結於人世間的道理，多少展現出其個人解經的特色所在。⓮

五、變遷的理論與敘述

《詩經》一書，時間跨度不小，從西周初年一直到東周時代，漫長的時間裡，各方面都會出現許多的變化。因此，「變遷」也就成了解說者不可忽略，必須闡釋的重點之一了。

「變」一直是《詩經》學的一項重點，這是因爲「正風」和「變風」兩個觀念所引起的。「變風」和我們所說的「變遷」，不是同一件事，但卻不能說毫無關係；因爲說到「變遷」，其理論的依據，多多少少與「變風」有關。關於《詩經》中正風與變風的議題，與本文無關，我們不作討論，僅對涉及「變遷」觀念者，稍作引述。

《詩集傳》中對於「變風」的解釋，都是引用學者的說法，朱子自己未作說明。引用者有：東萊呂氏（祖謙）、程子（伊川）和陳氏（傅良），茲錄於下：

>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

⓮ 程俊英、蔣見元說：「朱熹《詩集傳》曰：『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他比《毛序》高明處是看出這是棄婦自作之詩，但斥之爲『淫婦』，則封建衛道者的面目又令人生厭。」見氏著，《詩經注析》，頁 169。

> 爲變者，舉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爲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⓯

> 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閒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眾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⓰

> 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⓱

從這三段朱子引用的資料，我們可以看到，朱子與宋代之學者，討論《詩經》中的「變遷」、「變化」，與我們今天習用的觀念很不相同。在他們的思考裡，「變」來自「變風」，其著重之處，不是發展、不是改易、不是轉折等同於「變動」的觀念；那是一種回歸、一種循環、一種改正，好像走錯了路，必須回到「正途」那樣的想法。這裡不只是有一個事實在成長、在變化的現象，應予解釋；還有一個是非對錯、孰好孰壞的價值判斷，需要討論。

舉一個例子加以說明。朱子從〈秦風・無衣〉，談到秦地風俗。《詩集傳》曰：

> 秦地之俗，大抵尚氣概、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實，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嗚呼！後世欲爲定都之計者，誠不可不監乎此。而有國者，其於導民之路，尤不可以不審所之也。

在這段話中，朱子問了一個重要問題：秦地風俗是怎樣出現的？他從兩個層次來解答。第一、此一地區，曾經文王之教化，風俗應該最爲淳厚；而此時卻崇尚氣概勇力，輕生忘死，其間必然發生一巨大變化。重大變化的出現，固然是執政者之大力推動，而其能獲成效，原因在於秦地風俗，厚重質實，使得重農尚武的政策得以大行。進一步追問，秦人之厚重質實，緣於何處？朱子並不認爲是文王教化的成果，反而是地厚水深這類地理因素有以致之。第二、秦民厚重質實，基礎甚好，若能善加引導，

⓯《詩集傳・陳國十篇》，頁 85。按：《呂氏家塾讀詩記》原文開頭爲「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與朱子所引略有不同。

⓰《詩集傳・下泉》，頁 89。〔按：朱子取自伊川《易傳・剝卦》，略有刪節。〕

⓱ 同前註。

必有傑出之表現，足爲後世模範；反之，若引導之方向有所不妥，其所產生的禍害災難，勢將貽患無窮。所以，定都之時，須選民風樸質之地，不選風俗浮薄之區；而施政之方向尤須以仁義爲先，以愛民爲本。「先王之世」、「聖賢之道」的嚮往，時在朱子心中，應是非常明顯。如果此一分析大致不誤，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個層次，已回答了「秦地風俗」的問題，而且多方考慮，相當完整；第二個層次，談到了它的「意義」，似乎是多出來的贅語，但在朱子看來，這才是重點所在，非談及此一層次，不足以言完整，非提出這樣的論點，問題的意義不足以呈現。當然，用今天的話語來說，前一層次屬於「史實」的論述；後一層次則涉及「史論」的範圍。從另一方面來說，前一層次屬於「歷史事實」的解釋，而後一層次則可歸於「人文理想」的追求。筆者於此處不擬討論「史論」是否有其價值，[18]「人文理想」是否不可或缺，只是說明宋人思考歷史問題，有其著重之處，亦其特色所在，朱子的論述，其一例也。

《詩集傳》中，關於「變遷」的概念，也有一些屬於「第一層次」的論述，如〈小雅・十月之交〉，就是以「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來形容大地震的那首詩，其第二章，朱子的解說爲：「言所以致變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爲之主，故也。」筆者認爲，這一類的論述，並無特別精彩之處，亦非朱子所著重者。

六、心性義理與歷史論述

朱子的歷史論述，不只著重資料之中，字、詞的本義，時世與作者的考訂，情景與事實的描述與解釋，對於文本的義理，尤其著重。我們可以看到，朱子對一字、一詞、一句、一章的解說，都不只停留在表面的意思，而是力求深入，把深刻的義蘊呈現出來。所以，朱子從資料中講述歷史，最爲重視的，大概就是資料的「深度」了。因爲，一切的表面的現象，紛紛紜紜、林林總總的事情之下，就是做這些事的人，他們的思考、態度、情感、意志等等，簡單地說，就是人們的「心意」。只是敘述事情的經過，分析它的原因，說明它的影響，對朱子來說，都是過於膚淺，都是有欠深入。惟有進入人們的內心世界，探討其內心活動，從人性與道理上加以分析評述，這樣的認知方有意義可言。

[18] 何兆武說：「史論應該說是我國悠久的歷史傳統之一，是歷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史家可以充分馳騁自己思想的廣闊天地。從『太史公曰』、『臣光曰』到王船山的史論隨處可見令人嘆服的精闢見解。史家的洞見全在于其發之于史論的史識。……史料是客觀給定的、是有限的、對所有人都是一視同仁的；但是人們的思想認識則是不斷變化或不斷深入的，所以呈現于人們心目之中的歷史構圖也就必然隨時不斷地在改變，日新又新。這是歷史學永遠不斷在更新的原因所在。惜乎多年以來我國史學界在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太少了。」見氏著，〈思想的葦草〉，《歷史理性的重建》（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162。可以參考。

朱子怎樣深入理解詩意呢？不妨舉例說明。〈邶風・谷風〉是一首棄婦訴苦的詩，第二章有云：「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我們看看現代學者如何解說。程俊英、蔣見元說：「朱熹《詩集傳》：『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遲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經典釋文》引《韓詩》云：『違，很也。』馬瑞辰《通釋》：『《廣雅・釋詁》：怨、愔，很也。《韓詩》蓋以違爲愔之假借，故訓爲很。很亦恨也。《書・無逸》：民否則厥心違怨。違與怨同義，中心有違猶中心有怨。』按：馬說亦通，但從全詩情調看來，似以朱熹之說爲長。」[19] 我們在這裡看到，朱子與清代學者馬瑞辰解詩的方法差異很大，朱子是體會情景，進入內心；而馬瑞辰則全是文字的訓詁。朱子用的是思考、感受，馬瑞辰則是在故紙堆中找證據。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學者比較二家說法，所下的論斷，「似以朱熹之說爲長」不只是評比解說的高下，同時也是評比兩人所用方法的高下。

再舉〈豳風・東山〉一詩，說明朱子闡釋詩意的特點。揚之水說：「詩三百，最好是〈東山〉。詩不算長，也不算短，而句句都好。它如此眞切細微地屬於一個人，又如此博大寬厚地屬於每一個人。〈東山〉恐怕也是〈風〉詩一百六十中最少爭議的一篇，大概最多是對詩作者各說幾句推測的話。不知道它是不是可以融化人生中的一切冷漠，但總之多少板著面孔的經學家讀到〈東山〉，好像一時間都變得『融融』也，『泄泄』也，於物理人情都很通達。」[20] 當代學者趙麗雅（揚之水爲其筆名）解說〈東山〉，約略舉出毛公、鄭玄以及清人賀貽孫、牛運震，未提及朱子。朱子怎麼說這篇詩呢？朱子寫道：「《序》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21] 愚謂：完謂全師而歸，無死傷之苦。思謂未至而有思，有愴恨之懷。至於室家望女，男女及時，亦皆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蓋古之勞詩皆如此。其上下之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患也。」朱子的這番話有幾個重點，一是，他先對《詩序》做一解說，其方法如同上述解說〈谷風〉的詩句，同樣是朝著體會情景，進入內心的路向。朱子說：「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詩以勞歸士。」認爲此詩是周公所作，所呈現的是周公之情，也是東征士卒之情。二是，朱子藉周公與東征之士的情志交孚，說明周室享國之永，在於上下之間，相親相愛，宛如家人，引申出情深意愜，國乃可久的

[19]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頁 93 。

[20] 揚之水，《詩經別裁》（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頁 141 。

[21] 揚之水在文中加以引錄，說：「雖然不算得怎樣的見識，但能夠就詩說詩，且說得如此誠懇，在詩序中也就難得。」同前註。

道理。這裡包含著深厚的人文精神，呈現出崇高的人文理想，儘管可能脫離實際，卻也令人嚮往不已。

再舉一例。《世說新語・文學》記有：「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謝玄小字）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告。』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晉書・列女傳》的記載略有不同：「（謝道韞）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22]《晉書》此一敘述，似較《世說新語》更爲人們津津樂道。但是，「訏謨定命，遠猷辰告」仍是深受人們重視的詩句，我們不妨看看朱子怎樣解說。此句出於〈大雅・抑〉之第二章，全章爲：「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詩集傳》曰：「訏，大；謨，謀也。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猷，圖也。遠謀，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言天地之性人爲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爲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爲天下法也。」朱子把「訏謨」、「遠猷」解釋爲「有天下之慮，爲長久之規」，儘管有所引申，卻頗有「雅人深致」的意味。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天下之慮、長久之規」的根源指陳出來，那就是「天地之性人爲貴」，意思是人性乃秉承天地之理，人的尊貴與價值即在將此天地之理展現出來，作爲天下共同依循的準則。天地之理只要有所展現，天下之人必然隨風景從。因之，這種「大謀」、「遠圖」，不只是政府的政策或宣告，它是在上位者所規劃的最重要的治理藍圖；其所以能長治久安，主要在於它遵從並展現了人世間的道理，也就是「盡人道」。這些充滿人文理想的話語，在朱子的《詩集傳》中一再呈現，當然是他理解以及論述這些古代資料時，最爲重視與強調的地方了。

這樣看來，朱子好像把《詩經》當成一本說理講道的書，遠離了古代事實。其實不然，《詩經》中的篇章，朱子經常是從歷史的角度來閱讀與理解。就以全書最短的一首〈唐風・無衣〉而言，朱子就是從歷史的角度解說的。這首詩僅兩章，每章三句，一共六句而已。詩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我們先看今人怎麼說它，程俊英、蔣見元說：「這是一首攬衣感舊的詩。古代製衣的工作多由婦女擔任，這位被稱爲『子』的製衣者，恐是作者的妻子。她爲什麼不在了，是離散了，還是死了，從詩中看不出來。倘是故世，那便是傷逝的詩了。聞一多說：『此感舊或傷逝之作。』他體會詩意比較正確。

[22] 請參見張元，〈朱子講歷史之七：周宣王時的大臣仲山甫〉，《歷史月刊》221（2006）：110-114。

《毛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也。』朱熹《詩集傳》也以爲是晉武公向周天子要挾封侯之詞。但我們細玩詩的內容和風格，總覺得這類講法之無稽，恐皆附會。」今人不認爲這首詩與歷史有關，不同意古代最重要的兩位解《詩經》者所採取的路徑。毛公與朱子兩人，路徑雖同，但觀點迥異；毛公「美晉武公」，而朱子則「斥晉武公」。我們再看朱子是怎麼說的：「《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言我並非無是七章之衣也，而必請命者，蓋以不如天子之命服之爲安且吉也。蓋當是時，周室雖衰，典型猶在。武公既負弒君篡國之罪，則人得而討之，而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賂王請命，而爲說如此。然其倨慢無禮，亦已甚矣，釐王貪其寶玩，而不思天理民彝之不可廢，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嗚呼痛哉！」在這裡，我們讀到朱子講述的重點在於藉一件史事呈現一個道理，什麼道理？那是一個人世之所以爲人世的道理，也就是他所說的「天理」和「民彝」。實際上看，那是「王綱」，王綱不振，人紀絕矣。這是朱子的解說，今天的我們大概無人同意，但重要的不是「實際」的情況，而是「道理」的本身。筆者的意思是，今天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有其維繫社會正常運作、發展，最爲根本的「道理」？也是人人必須依循、遵守的準則？譬如：誠信、公平、正義，[23] 是不是我們必須維護，不容破壞的「人世間的紀綱」，簡單地說就是「人紀」？我想，我們應該都會同意。因爲我們不能想像，一個欠缺誠信、公平與正義的社會，可以長期維持、發展下去；我們也不能想像，一個不努力維護這些基本理念的政府，值得人民尊重與服從。這樣的道理，明白淺易，再看看朱子所說，不也是同樣的用心嗎？

七、小結

古代的世界，對於想要認識過去的人們來說，有著永恒的誘惑。我們如何進入古代世界，接觸它、認識它、瞭解它、欣賞它，那就非得依靠資料，而且是精彩的資料不可了。資料之中，不論是前人留下典籍，或是現代學者的論著，都能爲我們搭起一座座的橋樑，幫助我們進入那未知的天地。我們是不是只要閱讀這些資料，就可以遨遊古代，上友古人，眞正享受歷史知識的饗宴？其實未必。因爲我們必須先要「讀懂」資料，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3] 這幾個概念，似乎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其實不然，在中國傳統之中，「民無信不立」、「不患寡而患不均」以及「正其誼不謀其利」都有相似的義理。

我們只要下了功夫，認眞閱讀，難道會讀不懂嗎？不一定。因爲是否讀得懂，是否掌握了資料的精義，不完全是功夫的有無，更重要的是方法的高下。閱讀必須講求方法。一、如果展卷之初，心中已有定見，讀到不合己意者，即略去不讀，全書讀完，觀念想法依舊，這樣的讀書，顯然不見成效，方法必然有誤。二、閱讀之時，儘量思考文本作者的想法，儘量進入作者的心中，設想其何以如此思考、如此構想，這樣讀書，方能理解作者的撰述主旨，增添自己的新知，這是正確的方法。三、閱讀之時，要仔細思考作者的表述是如何建構起來的，要能分析出資料文本的結構。因爲任何爲人誦讀的歷史作品，都有其「結構」，而且都是層次井然，完整嚴謹，非如此不足以稱之爲「歷史知識」。[24]因之，閱讀之時，注重文本的結構，即是取得知識的主要方法。

《詩經》無疑是我們瞭解古代世界，認識古代人們生活、想法、感受等等的重要典籍。朱子著《詩集傳》，從一字、一詞的釋義，到一句、一章的解說，到整篇作品的闡述，層次井然，完整嚴謹，呈現出堅實的結構。朱子又從人生的最實際、最細節之處開始，對不同時世作出描述，談到生活的各種情景，制度的各種運作，政事的各種狀況，進而談到情勢的變化與轉向，再提及人們心中的歡快、愉悅、哀傷、痛苦等各種感受；最後總結到人生在世的最根本道理，惟有天地之理與人性之善，方能證明人生的價值與意義；也是層次井然，完整嚴謹，同樣是十分漂亮的結構。如果我們從「結構」的角度閱讀朱子的論述，非但可以經由他所詮釋的《詩經》進入古代世界，同時也對中國傳統經史之學，其論述方式之嚴整優美，留下深刻印象。它既是一種「結構」，同時也是一種「典範」，是值得今天我們在閱讀歷史著作、撰寫歷史論述之時，可以認眞思考、努力學習的典範。

[24] 請參讀 Mary Fulbrook, *Historical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2002), 特別是第三章 "Historical paradigms and theoretical traditions."